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五期 ——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310c)

---

【青春有悔】	为心道歉	林 衍·高四维
【难忘岁月】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中）	孙 耘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三）	孙怒涛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青春有悔】

### 为心道歉

• 林 衍·高四维 •

陈小鲁已经 67 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 POLO 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 89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 47 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 8 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 15 名曾经的学生，头

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

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

“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点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

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

“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之前，陈小鲁接到一个《纽约时报》女记者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我曾经采访过你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

几天后，这名70多岁的老记者如愿见到了陈毅的儿子、也已经年近70的陈小鲁。

“那时我很幼稚。”她告诉陈小鲁，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名左派大学生，1967年她慕名来到中国，并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得到过他的亲自接见。在中国的时候，她也穿军大衣、戴红袖章，打着红旗到处参观。

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就像帕金森病一样。”陈小鲁拿起摆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个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说是失误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问题，不正视，怎么解决？”

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每个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反思不见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发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尊铜像。“也有同学私下里向还在世的校领导道过歉，但打人者都背着很重的包袱，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此公开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鲁的事后很受触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社会历史一个交代。”郝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经发短信询问陈小鲁关于公开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陈的回复：“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身体近况、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雾霾天气。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出这场聚会的不同之处。比如，当他们分成两排落座时，忽然有一个老人问起另一个老人：“咦，我是不是教过你？”

47年后，老师不再像是老师，学生也不再像是学生。他们的年龄之和已经超过1500岁，而相互之间的年龄界限却不再那么分明，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这场聚会上，他们又部分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们出现在一张张的照片里，在会议室内的投影屏幕上反复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着，有的老人被旁边的挡住了视线，就用手拄住桌，探着头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来。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

循环播放的照片里并没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残酷的回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就冒出头来。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当年的物理老师张连元刚一张嘴，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问题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学的人民教师，于1968年坠楼身亡并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

在将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上，仅有这两次，老师们流露出了内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

“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

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

所有到场的老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曾经的胡同平房已经变成金融街的高楼大厦，水泥地操场也被一座奥运会级别的现代化体育馆所取代。但陈小鲁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回当年的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他并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被一群突然冲上台来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讲起这段往事时，陈小鲁朝校园里看了一眼。国庆长假还没有结束，除了几个保安之外，学校里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 原载《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899期

~~~~~

## 【难忘岁月】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中）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

• 孙 耘 •

（上接 z k 1 3 1 0 a）

Y：工作组时期最主要的事件是批蒯大富，揪出蒯式人物好几百人，即所谓“蒯派”。那时你算什么派？

S：刚回学校时我跟不上形势，看到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等行为觉得不可理喻。6月中旬开始就有人批评、质疑工作组，比如王铁成，口气很大，感到有些狂，我跟不上他们的思路。后来看到“访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是李小忠从林学院转抄的，感觉讲得有水平。李小忠是李文藏、甘小杰、吴文忠三人的化名，后来被打成“小三家村”。23日蒯大富等人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了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然而，6.24辩论会上工作组一下子就给他上纲到反党夺权，更令人反感。那天我去过辩论会现场，大礼堂楼上下挤满了人。我挤在过道上回头往上一看，突然担心：二楼会不会塌下来？于是又匆忙挤了出去，在外面听辩论。那一天场面的壮观，群情的激昂，可能在清华历史上空前绝后了。没想到一天



以后风云骤变，传达了李雪峰讲话，代表队连夜组织游行，高呼保卫工作组，声讨蒯大富。

反蒯开始了。我小心翼翼地参加工作组安排的各项活动。工作组封锁了校门，外人不准进，学生不准出；还听说要像反右时一样，给学生分成四类，准备抓右派。我内心充满了压抑和危机感。刚回校十多天，就经历了惶惑、兴奋、骚动、压抑、惶恐这样的情绪起伏，内心受到很大刺激。那些天，校广播台总播放一首歌颂战斗英雄的歌：葵花向太阳，嘿，战士心向党，麦贤得光荣入伍保卫海防……多年以后，只要听到这首歌，内心就莫名其妙地觉得压抑、难受。前些时候与汲鹏同学偶然谈起，原来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他一听到这首麦贤得和才旦卓玛唱的“太阳啊，霞光万丈……”心里就感到特别难受。工作组的“五十天”使大多数清华同学都有类似的感受，这是必然的巧合。

蒯派们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纷纷认罪投降，唯有蒯大富又臭又硬，坚持到最后。这是老蒯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反蒯”延续到7月下旬。7月22日开始，陈伯达、江青、康生多次到北大座谈、演讲，强烈批评工作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公众面前正式亮相。那时我才知道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认定她的讲话代表毛主席，尽管她曾在北大当众流泪，自称“阶级斗争斗到我们家里来了”，让大家惊愕不解。随即，中央文革代表党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建议由群众无记名投票，按巴黎公社的方式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新的权力机构，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这些话说到大多数师生的心坎里。陈伯达、康生还强调，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党员不一定是代表党的。这个提法让人耳目一新，等于给群众一把尚方宝剑，可以自行检验、评判各级党组织。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点名让蒯大富等“少数派”参加。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派工作组问题作了检查，李雪峰宣布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最后出来与大家见面。会后蒯大富贴出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人们完全想不到，没过多长时间，天又翻过来了。

Y：形势的发展的确让人眼花缭乱。那时你有什么感受？

S：尽管我不是蒯派，我同样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如果说，以前的教育让我觉得毛泽东是高高在上的天神，现在则亲身体会到毛主席与我们心连心。中央文革就是毛主席派来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王光美秘密坐镇清华指挥反蒯，将几百名师生打成反革命，使大多数师生员工对王光美和刘少奇心生反感。王光美讲：“我代表少奇同志…”，“下自行车伊始…”以及打饭做秀等等，反而增加了人们的轻蔑。所以，当毛泽东表明态度以后，清华井冈山就充当马前卒，带头批斗王光美，炮轰刘少奇。

Y：我明白了，这是你后来成为坚定的造反派的一个思想基础。

S：还不止如此。工作组刚下台，血统论对联就传入清华，我又被兜头浇下一盆冷水。8月1日北航附中学生把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 鬼见愁”贴到清华，放言要辩论。清华同学中不乏有胆有识、有政策水平的佼佼者。有的干部子弟站出来批评对联，比如自七的吴慰庭；也有黑五类子弟上台表示异议，比如电九的李磊落。然而对联的拥护者人少而势大，辩论的武器是辱骂、拳脚加铜头皮带。他们组织起红卫兵、贫协等“阶级队伍”，高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很快在清华形成一马长嘶万马皆喑的局面。血统论甚嚣尘上，多年的压抑上升为恐惧，让我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又面临一个难以测度的深渊。在惶恐中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思想负担最重的一个星期，直到8月8日晚间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在高校师生中产生巨大震动，如《清华文革亲历》所记，听到广播后，当即“辩论会中止，全校欢腾，连夜游行庆祝”。我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情绪由兴奋转而激奋。《十六条》再次申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强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不讲什么出身成分，而是“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我反复研读，备受鼓舞。走

资派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当左派，为反修防修贡献力量。8月10日晚，毛泽东亲自来到群众接待站，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幸赶上这场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我明确了目标，有了底气，再也不怕气势汹汹的老红卫兵查问出身，谭力夫讲话出笼后也敢于理直气壮地批判。后来，老红卫兵在所谓红八月中制造“红色恐怖”，引起天怒人怨，同时干扰了批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中央文革遂明确表态：血统论对联是“反动对联”。

Y：也就是说，经过血统论的冲击，到十六条发表，毛泽东发出号召，你就决心做坚定的造反派了。

S：那时，我感到自己再次获得解放，而且是真正的彻底的解放。毛泽东的号召点燃了我的革命激情，“造反有理”不再是红五类的专利，谁也不能剥夺我革命的权力。“革命倍觉主席亲”，我要全身心投入文化大革命，在革命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跟着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回顾这段经历，当年的青年学生虽然脱离不开时代的局限，但大多有理想、有抱负，有精神追求。他们激进、敏感，又简单、幼稚，如马克思所说，容易“轻信”。毛泽东是发动群众的高手，深谙驭人之术。当你被压在底层，甚至掉进“反革命”泥坑时，他一把拉你起来，告诉你：你是革命先锋，向前冲吧。你自然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甚至为之献身。我想许多平民造反派都有类似的心路。

同学中的干部子弟，特别是中学生“老红卫兵”是另一类群体。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他们天生对政治很敏感，文革前就以接班人自居，在北京闹起学潮，要求贯彻他们的“阶级路线”。文革工作组撤离时出现权力真空，他们马上成立红卫兵、贫协，并宣扬极端的血统论。对“权”字他们情有独钟，有着舍我其谁的偏执，对联更反映出他们的狂妄和狭隘。他们自恃根红苗正，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敢想敢干的冲劲超过大学生，在初期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把第一波造反烈火烧到全国各地，例如揪斗文教领域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斗牛鬼蛇神，以及“扫四旧”，搞“红色恐怖”等等。没过多久，到1966年秋天，当文革烈火烧到他们自家门口时，许多人又转为保爹保妈的保守派，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批判中央文革。一部分人就此开始了新的思考。应该承认，相对于我这样的平民子弟而言，在政治上他们是早熟者。

与老红卫兵针锋相对，另有一些先知先觉者，典型代表是遇罗克。他的“出身论”从反击血统论对联入手，全面批判共产党的阶级路线，言论大胆而深刻，震撼人心。我读后虽然很有共鸣，但没有勇气和水平同阶级路线叫板，像许多出身不好的人一样，只想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来证明自己。

Y：咱们继续往下谈。当时有个“八八串联会”，要继续批工作组，还有“八九串联会”，强调斗黑帮。你站在哪一边？

S：我当然是八八派观点，但没有参加八八串联会，因为那两天正紧张地准备出去串连。

Y：串联？好像那时中央还没有号召大串联呀。

S：你的记忆没错。《十六条》一公布，学校再次大乱，但各地运动发展不平衡，外地一些受压的大学生跑到北京上访告御状，控诉工作组和当地领导，要求中央派人去解救他们。大约8月9日，力八梁春沛、鲁炎杰等同学贴出大字报，要发扬12·9革命精神，把革命火种带到全国。他们受到西交大来京告状学生的邀请决定去西安，最后组织了近20名学生，以力八两个班为主，我们队有两人随孙铮参加，还找来辅导员周彦煌（力七）当带队领导。形势严峻，时间紧迫，我们匆忙到食堂退了粮票菜票凑出旅费，到学校开了“实习”证明以便买半价票，12日就登上了去西安—兰州的火车。组织一支成规模的队伍到外地串联，我们在清华应该算头一个。在火车上遇到北京灯市口女中和30中的学生，她们要去兰州支持革命派。兰州的情况比西安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看过大字报，兰州大学有个李贵子臭名远扬，他们得到甘肃省委

支持，残酷迫害革命师生，还到铁路中学等单位制造过流血事件。火车上的列车员都力劝我们到兰州去，解救受压的革命群众。一种使命感让我们改变计划，决定直接去兰州，然后再去西安。

Y：当时兰州是什么景象？你们怎样煽风点火，支持革命派呢？

S：1966年8月14日到达兰州。一下火车就大吃一惊，只见车站广场红旗招展，站满了夹道欢迎的人群，还有整整齐齐一排一排人都举着毛主席像，感觉很新鲜。省委把我们北京来的一行人接到招待所，主管文教的副书记马继孔出面接见，一开口就说：我们欢迎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组。我们马上声明：我们只是清华大学学生，不是工作组。回过头来想，那时中央还没有号召大串联，人家很难相信一群普通学生会自发来到几千里以外搞革命，肯定认为我们有背景有来头。我们虽无政治斗争经验，但革命性、警惕性蛮高，所以拒绝住省委招待所，而是步行前往兰州大学，省委的车只好跟在队伍后面。到兰大后李贵子马上“接见”我们。大名鼎鼎的李贵子是五年级学生，衣着朴素，做派老练，说话口气很大。他为我们安排了招待所，我们则坚持住在教室，到学生食堂用餐。当天，我们就分头下到铁路、工厂、学校以及兰大内部作调查。

兰大的校园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感觉到一种白色恐怖的气氛。但我知道，有许多双眼睛在注视着。我多次遭遇这种情况，走到一个避静的拐角处，会有一个人叫住你，向你控诉所受的迫害，然后又悄然消逝。他们都是被李贵子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学生。我同情他们，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他们也向我倾诉，对我充满信任。我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革命情谊，那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纯正的、真挚的感情，至今值得回味。写此文时我查询有关资料，又记起几个熟悉的名字：朱选、陆保珍、张明生等等。如今他们都已年逾古稀，不论过往的生活有多少曲折，我祝福他们有个幸福的晚年。

15日是我们调查的第一天，结果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省委要组织周边农村的民兵进城，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紧急开会研究对策，觉得必须设法制止省委的行为，当即决定：1，派鲁炎杰等三人速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他们在铁路局帮助下18日清晨赶到北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要求面见周总理。2，因为不清楚军队的态度，派我和孙铮、孔繁胜三人马上去兰州军区，要求军队保护革命群众，起码要保持中立。3，其他人继续联系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注意有关动向，做好应急准备。

我们三人当晚来到兰州军区，说明情况，坚持要见司令员张达志中将，见不着人我们就赖在那里不走。等到午夜时分，张司令只好出来接见。我们顾不得落座，急忙报告“紧急情况”，并告知已派人向中央汇报。张司令个子不高，面带微笑，显得稳重而和善。他背手站在那里听我们讲述，并不插言，最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都知道，你们放心吧，要相信我们。我感到，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委态度不一样，心里踏实多了。谈完话天已很晚，张司令派他的警卫员送我们回校。那位年轻军人身穿便装，推一辆自行车，示意我们包里有防身手枪。他边走边聊，似乎对省委很有看法。到兰大门口时，一辆小轿车打着大灯开过来，他急忙转过身并用手遮住脸庞，嘴里嘟哝道：是省委的车，不能让他们看见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任务，很有点成就感。我更感到惊诧的是，省委与军区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居然存在不小矛盾，有些不可思议。

Y：后来农民进城了没有？发生冲突了吗？

S：可能这些传言原本就是杯弓蛇影，也可能我们的努力起了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农民进城的事。然而，新的挑战接踵而来。兰州大学李贵子要召开全市性的万人大会，辩论省委问题，指名道姓要我们发言。那时，批判省委的属于非主流的少数派，受省委支持的一派占据很大优势。我们立即闭门研究对策。鉴于兰州以往的情况，很担心有人冲击会场，甚至对我们动武，遂商定开会时占据靠近主席台的位置，大家要围坐在一起，让周彦煌坐在中央。那么谁去发言、怎样表态呢？按常规，由周彦煌发言是理所当然的。大家尚在议论纷纷时，我脑筋一动，提出自己的意见：首先，上台发言有人身危险，周彦煌是我们头头，要重点保护；其次，他的

苏北口音北方人不容易听懂。我建议由我去发言，我的普通话没问题。关于如何表态，由于我们刚到兰州，调查不够深入，不宜“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随意上纲上线。发言要简短明了，既要明确指出问题，又要体现我们的政策水平。这样一说，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还责成我起草发言稿。

16日晚间，大会在兰州大学操场召开。偌大的操场坐满了人，举着红旗、标语牌和毛主席像，在数盏聚光灯下可以清晰分辨出不同单位的一个个小方阵。主席台好像是临时搭建的，我们按计划围坐在主席台旁，没有人上主席台，也不知主席台上有什么人物。开会不久就轮到发言。我稳步走上主席台，眼望前方，台下人山人海鸦雀无声，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我顿了顿，用缓慢的语速，一字一句地大声念发言稿。第一句话先明确我们的身份，是“代表14日到兰州的，清华大学、北京30中、北京灯市口女中的同学发言”。我简单描述了某些单位工作组迫害革命群众的事实，对照毛主席指示和《十六条》，最后指出，造成兰州万马齐喑的形势，“省委是有责任的”。这句结论性的话是我挖空心思的得意之作。它没有按《十六条》的四类划分给省委定性，只不过指出省委对迫害群众负有责任，这就足以点起一把火了。我在台上一字一顿地高声说道：“我们认为，省委是有责任的！”只见操场远处几块方阵爆发出一阵掌声欢呼声，红旗摇动久久不能停息。我的发言引起一阵骚动。后边几个发言都是保省委的，其中有一名年轻的劳模，声言要送一套毛主席著作给清华学生。我再次上台接受了馈赠。第二天，兰州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宣传画，“省委是有责任的”这句话传遍大街小巷。兰州的革命烈火再次被点燃。19日，鲁炎杰他们在北京受到陈伯达、王力接见。中央文革严厉批评了甘肃省委，紧接着就宣布主持省委工作的副书记裴孟飞和马继孔撤职，李贵子也不知去向。兰州的天翻过来了，革命群众扬眉吐气了。我们亲自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内心充满了自豪感。那时，我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涨又很纯真，全心全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十六条》强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中央文革首长一再讲“不要当保姆”。现在群众已经解放了，文化革命往下怎么走，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群众越信任我们，我们越不能当保姆。于是大家统一思想，决定尽快离开兰州。

兰州串联是我第一次主动参与政治。在兰州，我们按“十六条”办事，自己既当左派，又充当左派的拯救者，从而更坚定了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在兰州我有意表现自己，检验自己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为自己勇于任事、敢为人先的作为而自得。我平生第一次上台发言，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万人大会上讲话，你只能听到喇叭里传回来的自己陌生的声音，那种感觉很奇妙。总之，兰州之行让我找回了自我，增强了信心，敢于再次对自己说：你能行。

我们在兰州这段时间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第一次大串联开始；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老红卫兵“扫四旧”，打砸抢，搞“红色恐怖”；8·24拉倒清华二校门，等等。这些事件我们都没赶上。8月下旬，赴兰州的一部分人取道宝成线到重庆，住在重庆大学，依旧到各处鼓动造反。9月中旬，我们一行人乘船到武汉，再转火车回到北京。当时学校的行政工作还由“三临”主管，因为串联坐火车已经不要钱了，我们就找刘涛签字报销了火车票。

Y：兰州之行你们与革命群众成功地互动，有一定代表性。怎么看待文革初期全民的这种积极参与？

S：文革初期，撤销工作组发布《十六条》以后，全国群众纷纷起来造反，人人自觉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许多家庭内部或亲友之间都争论不休，人们纷纷依观点“自由结社”，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祖国大地。在后来看来，好像全民都吃了兴奋剂。其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指出了各种因素：文革前干群矛盾的积累，老百姓对毛泽东的愚忠等等。我个人体会，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对民主、自由、平等有一种天然的追求，是人性使然。这种追求在专制社会常表现为对明君的渴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又往往变为无政府主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西方中世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提出“圣经”是至高无上的，人人可以通过读圣经与上帝沟通，否定天主教层层“教阶”的权威，体现了新生资产阶级追求地位平等的政治要求，是一种社会进步。无独有偶，文革初期我们鼓动群众起来造反时，常引用陶铸的一句名言：党的领导就是十六条！也就是说，通过学习十六条，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能够直接地、自主地领会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而摒弃直接管理他们的党组织体系，体现了他们追求民主、

追求平等的愿望。兰州和重庆的经验告诉我们，陶铸这句话用于发动群众是百试百灵的法宝。

今天看来，《十六条》的发表是文革初期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从此，“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就代替“听党的话”成为举国上下最时髦的话语，而不再强调党的“组织观念”。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然而，令党的领袖始料不及的是，民主犹如“天方夜谭”里的妖魔，一旦从魔瓶里放出来就很难收回去了。而且随着社会阴暗面的公开暴露，各级干部头上完美的光环被彻底打碎，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应该说，破除党组织的权威和神秘感是文革带来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进步。

Y：你分析得似乎有点道理。回校后你参加哪个红卫兵组织了？

S：1966年9月的清华，与外地的轰轰烈烈相比，让人感到冷冷清清。“三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外地来京学生。校内几支红卫兵还固守着清一色的阶级路线，排斥出身不够格的人。9月23日蒯大富他们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而且很快就突破了血统论，敞开大门招收非红五类出身的“兵团战士”，不发红卫兵袖章，但佩发“井冈山”的小证章，并且申明在内部一视同仁。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上了井冈山。那时进出一个组织很自由，我不记得填过什么表，也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纯粹是山上的散兵游勇。

Y：井冈山的组织的确松散。按照惯例，你总要属于某一个战斗小组吧。

S：10月3日《红旗》第13期发表社论，向造反派发出新的进军号令：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不久，井冈山兵团在阶梯教室开会，组建“南下野战兵团”去云南昆明串联。我们一群散兵游勇，包括孙铮，马莉等人凑在一起组成一个战斗组。这时，看到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寻找伙伴，我知道他，是校乒乓球队知名的黑五类子弟李磊落，就邀他加入我们小组。于是，来自4个系、4个年级的5名女生和4个男生就偶然地凑在一起，组成后来小有名气的“打落水狗”战斗组。李磊落的加入，不但增强了战斗组思想上的凝聚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我的，以及我们大家的人生轨迹。

Y：李磊落当年很有名，都知道他死在湖南武斗中。

S：李磊落是电91班学生，校乒乓球队队员。他有才华有思想，有抱负有志气，可惜天妒英才生不逢时。据说他的父母年轻时曾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来又脱党当了逃兵，解放后曾被关押，后来靠做小生意为生。李磊落背着“叛徒子弟”的包袱进入清华，但他上进心极强，所以格外追求进步。1966年8月2日在大礼堂辩论血统论对联，李磊落勇敢地跳上台，声言：我脸黑心红，黑小子照样干革命。结果被老红卫兵连推带踹下台。1966年“红八月”中，他的叛徒父母“双双被打死”的传闻和贴满宿舍门墙的大小字报使李磊落一下子成了体育代表队的名人。我们很难体会李磊落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煎熬，但他在我们组的一系列表现，直到在常德牺牲的前一刻，都在向人们重复着同一句话：我脸黑心红，我是真正的革命者！

Y：噢，李磊落原来有这么悲惨的经历。你们战斗组一起去昆明了。

S：10月16日，“井冈山南下野战兵团”一行几十人乘火车去昆明。我们组的成员在火车上会合，算战斗组正式成立，推举我当组长。当时正传抄毛泽东的一首新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最后两句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细细品味这富有哲理的两句话，觉得对我们特别有指导意义，于是给自己的战斗组取名“肯登攀”。

昆明的串联学生很多，最抢眼的还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他们依旧身着军装，腰系皮带，还有人身带棍棒匕首。随着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兴盛，这些干部子弟大多变为保守派，双方自然会发生冲突。我们此时已不再顾忌血统论，也不怕他们的皮带匕首。有一次发生武力冲突，我们人数众多，身高体壮，赤手空拳还略占上风。后来省委书记阎红彦开会接见，我就坐在他旁边。那时阎书记尚未受到大的冲击，表现得稳重平和，有长者之风，想不到没过多久竟然自杀了。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仍有许多未解的谜团。

在昆明，我们小组时常在一起学习讨论，议形势，谈认识，各抒己见。李磊落政治敏锐，

思维活跃，能引领大家提高认识，最后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可以说，他是我们组的精神领袖。《红旗》十三期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认为，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李磊落的一些“经典”言论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让夫人亲自出面指导文化革命运动，可见已处于少数地位。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革命的要害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当时听了这话，有振聋发聩的感觉。经过多次形势分析和讨论，我们认定，文革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批判刘少奇，直到把他拉下马。得出这个结论让我们感到吃惊，激动，兴奋，甚至还有点悲壮。我们决心充当毛主席的马前卒去冲锋陷阵。李磊落带头改名言志，取笔名“江林”，其含意不言自明。我的名字孙毓星平平淡淡，受另一位改名“宋耕”的启发，决定叫“孙耘”，意思是：要在革命道路上像老黄牛一样埋头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此外还有“毛伟”、“林迅”等名字，“迅”当然指鲁迅。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鼓动革命群众“学习鲁迅‘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敏锐地感知：这是毛主席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于是把战斗组更名为“打落水狗”。

Y：那时，多数青年学生都是理想主义者，革命性很纯真呀。

S：我们“打落水狗”战斗组可算某一类典型。成员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多数非红五类出身，也不是响当当的蒯派，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有强烈的使命感；都脱离原来的班集体寻求更广阔的天地；或许，还有较浓的小资情调。共同的理念凝聚成一种力量，使我们逐渐成为井冈山的骨干队伍。然而我们组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高潮中有一人牺牲，二人重伤，我则进了班房；毕业后几十年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有多人受到冲击。面对生活的周折，我们只能自嘲：“打落水狗”自己倒成了落水狗。唯有一点值得庆幸，我们组13名成员中出了4对“革命伴侣”。当年清华的战斗小组几百上千，像我们这样的经历够独特了。

Y：革命加浪漫，就像“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描写的那样。

S：可见古今中外青年人搞革命都带有浪漫色彩。当然，革命总是第一位的。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步行串联。从昆明返回时，我们临时决定从株洲下车，到湘潭住下准备步行长征。我和李磊落专程到长沙接待站借款35元，买了胶鞋、雨伞等必需品。这笔款1969年被追还，从我的工资中扣掉了。11月15日我们从湘潭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然后从韶山经湘潭、中路铺，过湘江到朱亭，经上屋场、攸县、茶陵，进入江西到龙市，最后到达井冈山上的茨坪，全程20多天。当时茨坪的巨幅画像还是朱毛会师，尚未改成毛林会师。我们参观八角楼，登上黄洋界，吃红米饭南瓜汤，唱红军歌曲，在烈士纪念碑前留影，好像朝圣一般。在山上我们得悉中央下通知暂停大串联，而且听说北京出现了反林彪和炮轰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就不再继续步行长征，乘卡车下山到吉安，经南昌转乘火车于12月8日回到北京。

Y：1966年底刮起所谓“十二月黑风”。你们28团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S：经过昆明之行和步行长征，我们全组增进了了解，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除一人以外，大家都继续在一起活动，而且人员有所增加。打落水狗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大字报和讨论会上。不久，动农系的臧令瑜找到我们，要把观点相近志同道合的战斗团组织起来，集中力量批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最初串联了十几个战斗组，选出几个作为核心：“雄关漫道”臧令瑜，“八一”李自茂，“第一星火”张兴华，“井冈志”吴文忠，“烈火”戴国珍，及“打落水狗”等。核心组第一次在2号楼开会，臧令瑜建议取名“送瘟神战团”，瘟神的所指不言而喻。我则提议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名字——28团，因为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是红四军28团，而28团团团长正是林彪。张兴华他们都表示赞成。于是，清华文革史上有名的“28团”就此诞生。刚成立的28团积极投入反击“十二月黑风”和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12·25大行动的积极鼓吹者和主要参与者，后来逐渐成为清华文革中一支重要力量。

关于28团，我想说明几点。1，“大事日志”上说12月24日发起成立，不知根据哪些原始记录。我的记忆应该再早些，大约在中旬。2，28团的成立与蒯大富无关，核心组里也没有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在28团与三纵队的论战中，总部支持28团的观点，同时还要保持凌驾于两派之上的姿态。3，1967年初，28团在社会上的主要活动包括：参与砸联动，主办联动展览等，只有个别人参与反康生的活动。4，28团以观点或思潮结合，组织松散，进出随意，很多战斗组都是自己宣称属于28团，而大家也就认可了。5，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为了“大联合，大夺权”，28团在3月1日宣布解散，几个纵队也相继解散。后来414串联会成立，28团逐渐变成团派核心骨干的代名词。

Y：照你的说法，28团组织松散，不分一二三把手，可为什么称呼你“团长”？

S：这本是戏称。67年1月，28团的主要发起人臧令瑜与中央党校“红战团”头头、艾思奇的秘书卢国英一起，串连一些群众组织炮轰康生，就是所谓“28团反康”。为此，臧令瑜险些被送进班房，好不容易检查过了关，就此淡出文革运动。“反康”对28团冲击很大，危难时刻，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负起责任，在内部外部撑起28团的门面。出头露面多了，有人就戏称我是“团长”。414串联会成立后，各系均设立分部。团派跟着也按系组建01——12部队，部分总部委员加上各部队一把手组成“部队核心组”。我是部队核心组成员，从此进入团派的领导层。

名不副实的28团团头头衔给我带来了麻烦。1970年深秋，学校大张旗鼓地“清查反革命组织5·16”。据说，有人对迟群讲：你知道“团派”这个叫法怎么来的吗？那是因为井冈山早期的骨干队伍叫28团。28团团头叫孙耘，肯定是5·16分子。于是就把我从内蒙古海拉尔抓回学校，进行了长达2年半的审查。

回顾这段历史，我从上井冈山，组建打落水狗战斗组开始，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进入28团核心组，表明我已自觉地要求自己站到运动第一线。之所以说“自觉选择”，是因为它是我过去生活经历的自然延伸，是我内心追求的一个释放，是自我觉醒的一个新阶段。因此，至今我不后悔，也不该后悔这个选择。

Y：我好像能理解你了。是不是你周围的许多人都有类似情况呢？

S：起码在我们战斗小组内，大家不但有共识，而且有一种正面的相互促进，特别是李磊落，对我个人以及我们全组影响很大。

Y：你多次提到李磊落对你们的影响，那么就着重谈谈他吧。

S：如果说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是因为参加了打落水狗战斗组。“打落水狗”之所以小有名气，就因为有了李磊落。在我们心中，李磊落这个名字永远不会忘怀。

李磊落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文革初期的不幸使他丢弃了以往的多愁善感，从一个普通学生变为一个思想者，进而成为一个战士，像殉道者一样用全部生命书写自己的忠诚，兑现自己的誓言。

步行串连回来以后，我们战斗组的人员有分有合，分头参加28团的活动。有人到兵团保卫组。保卫组负责维持治安，还与体院等单位一起策划砸联动的行动。有人去八一学校搞联动展览会，揭露老红卫兵一联动搞红色恐怖的罪行和种种劣迹。体育代表队一些人负责展览会的保卫，逐渐成为团派的一支武斗力量。我更多参与28团与三纵队的论战等活动。此时李磊落已不满足本组的小小天地，他有更深更远的追求。崔兆喜告诉我，1966年底，李磊落参加过一个叫“共产青年学会”的小组织，其成员有著名的伊林、涤西，还有当今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以及北大一些人。他们开过两三次会，学习、研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伊林、涤西“炮打林彪”以后，这个小组织就寿终正寝了。这说明李磊落当时的思想是活跃的、开放的，他在不断地思考、探索，得出自己的结论。他总提出一些惊人的见解，比如：对毛泽东要“崇敬到崇拜的程度，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社会发展



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他还结合现实斗争加以引申：“你要加入一个潮流，就要努力站到潮流的前头，引领这个潮流前进”，“不要做一个有了你更好的人，而要做一个没有你不行的人”。这些话语我闻所未闻，它表现出来的见地、志向和气魄，我惟有赞叹和钦佩。

李磊落率先走向社会。他支持中学里受压的少数派，积极筹办联动展览。北大附中高三学生朱彤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儿子，在红八月时，他曾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胸前的皮肉上以示忠诚，然而仍被红卫兵打得尿血，爬着回家，险些丧命。十二月黑风刮得猛烈时，李磊落把朱彤带到我们组避难，以逃离联动的追杀。

1967年“一月风暴”时，李磊落结识了红色洋人李敦白，由于理念相通，双方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时李敦白正和聂元梓一起搞“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参与北京市的夺权。2012年，在美国的沈昆同学来函说：“李敦白跟我通电话时提到了李磊落，我当时还挺惊奇。他告诉我，他和李磊落熟识，1967年春李磊落曾经找他，请他到清华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帮助。”我向蒯大富征询，证实确有其事。蒯还说：“李磊落那段相信到迷信的话就是李敦白告诉他的，当时觉得精辟极了。”查阅党史，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讲过这样的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需要个人崇拜”。李敦白应该知道这件事。

一月下旬，为“反康”的事，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指明要28团负责人参加，我和臧令瑜等人出席。一开始，江青说：文化革命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形势有了新发展，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江青询问大家的看法不过是一句客套话，出人意料，在大厅右后角有一个人突然站立起来，高声叫道：我发言，就噤噤噤走向主席台。定睛一看，竟然是李磊落。我感到奇怪，他是作为哪方代表来的呢？李磊落上去，拿着稿，大讲一通夺权后主要矛盾会转到革命队伍内部云云，大致是28团那套理论。没讲几句，江青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让他下台，随即进入正题，严厉批评反康。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只有我明白他，在寻找一切机会践行自己“站在潮流前头，引领潮流”的宣言。

Y：李磊落的确与众不同。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有某种情结。

S：那时的李磊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充满了革命豪情。我们保存着他的一份残破手稿，散文“满江红——与形左实右的战友共勉”，写于1967年春。他面对“二月逆流”，热情地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声令下，山崩地陷，寰球震颤。这个洪流冲决一切罗网，甩开一切绊脚石，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她狂叫着，呼啸着，冲击着，战斗着。她摧毁着座座挡路的阴山恶岭，破坏着条条保守的渠身浅道。……哪怕会遇上逆风千里，甚至有被狂风撕碎的危险，但她革命的脚步决不停顿，更不后退。……最后，李磊落仿照高尔基的“海燕”，激奋地高呼：让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时刻准备着！今天，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他那口号式革命词藻下的真实思想。但我知道，正是他自己的“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他在恣意抒发自己内心的激情。我还知道，在他的革命激情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自卑，那就是自己黑黑的出身。联动的喧闹已经证明，达摩克利斯剑依然悬在黑五类子弟头上，他们随时可能再次被人宰割。

李磊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是革命的，而且比你们更革命。视死如归是革命者的最高境界，于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死”的字样。比如，4月1日晚间，北大附近一个大草垛失火，我们都跑去救火，他回来后写道：死了又有什么，地球照样转动，革命继续前进。只要需要我一定毫不畏惧地献出生命。他在我们面前一再表示：要革命，就要主动地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四川两派率先动枪动炮，在成都132厂，地质学院一名学生中弹身亡，是北京学生的首例。李磊落带领一伙中学生——他的崇拜者，跑到四川支持造反派。中学生们体验到闹革命的惊险与刺激，但他们不了解，李磊落是要去接受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他回来以后自豪地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李磊落思想和行动总是超越我们大家，他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打落水狗”。

武汉7·20事件后，兴起第三次大串联，抓“军内一小撮”。1967年7月27日凌晨，



周恩来、杨成武等领导接见湖南代表时指出：湖南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改组；由47军进湖南支左；“工联”、“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组织。湖南，特别是湘潭和常德地区武斗很激烈。在常德，“工联”一派3000余人被军分区支持的“红联”武力驱赶到长沙。我们组的宋耕在西大操场斗蒋大会上结识了常德工联进京告状的人，他们特别希望“首都红代会”前去帮助。在李磊落的倡议下，打落水狗战斗组再一次统一行动，不去省会等热点城市，而到武斗激烈的常德去支援造反派，一同“接受血与火的考验”。那一刻，我们的心情激动又悲壮。

Y：在我看来，你们去参加武斗的动机的确匪夷所思。

S：客观地说，人的动机从来不是纯粹和单一的。当时的我们，在理想主义的光环下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和英雄情结，而潜藏在内心深处还有某种危机感和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诉求，当然，也不能排除青年人追求惊险浪漫刺激的猎奇心理。

我们一行十余人在7月30日到达长沙，会合当地的造反派，准备走水路回常德，因为公路已被封锁。李磊落目标明确，执意要冲到武斗第一线。他很快找到“华蓥山游击纵队”——一支由小青工和中学生组成的武斗队，向他们宣传革命形势，当上他们的“政委”。后来我们才知道，7·20事件后李磊落对形势的判断很严重，在日记中写下血书：“誓死保卫毛主席 江林 67·7·21”，临行前甚至安排了照顾弟弟妹妹等“后事”。他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奔赴常德的。

Y：他到底是怎么牺牲的？

S：8月3日我们乘两艘武装轮船随先遣队三百余人出发，走湘江进洞庭湖再入沅江，行驶2天到达工联的据点德山电厂。第二天，李磊落等人随一支队伍渡河进入常德市区夺枪，但一上码头即遭阻击，我校吴庚生同学被机枪打中，鼻子和肩部连中几弹，伤势严重。李磊落与华蓥山游击队断后，掩护大家退出常德。他们设法直接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并向省支左办公室报告，终于要来一架小飞机送吴庚生等伤员到长沙救治。吴同学大难不死，后来留母校工作，直到退休。

6日，由桂入湘支左的47军紧急派6961部队（团编制）经德山去常德制止武斗。带队的尹政委和王团长很重视北京学生，让我随他走在最前面，一起进驻军分区。当晚红联撤出常德，但市区周围枪声不断，战况激烈。夜半时分，有人说东门外专区医院有我们的伤员，处境危险。尹政委决定派一辆军车转移伤员。在组织掩护队伍时，李磊落对我说：你留在这儿，我去。他随即跳到车踏板上，挥手高喊道：同志们！我们是干什么来了……他的战前动员就跟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我看他赤手空拳站在车头踏板上很危险，让他坐进驾驶楼里，他却说：我至少可以保护解放军司机。汽车消失在夜幕中，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像有某种心灵感应。没过多久，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军分区，大叫：不好了！首都红代会的人被打倒了。我急忙组织一队人前去解救。车到东门清真寺附近，我们步行搜索前进，隐约看见街心俯卧着一个人。我跑上前去，抱起来翻身一看，正是李磊落，只见他肩颈之间硕大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的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襟，我的眼泪禁不住无声地流淌。同去的小吴告诉我，从医院返回时，李磊落依然不听他的劝阻，执意站在车头保护司机，结果在回程途中遭袭击身亡，时间大约是8月7日凌晨一两点钟。李磊落的遗体停放在军分区院里，我们组的孙铮和宋耕不知何时来到军分区，见状就嚎啕大哭。当地的武斗队员们个个情绪激愤，眼睛瞪圆，发出骇人的闪光。我突然听到屋里劈劈啪啪的响声，还夹杂着人的呼叫，与孙铮进去一看，一个叫黄闯的人一边骂着一边用板凳砸向一位年长的军人，据说是军分区副司令员。副司令满面血迹，靠在墙角。这位闯将越打越气，突然拔出手枪就要击发，个子矮小的孙铮眼疾手快，也不知哪里来的胆量，一把将他的前臂推向上方，只听啪的一声，一颗子弹射到天花板上。这一推解救了那位副司令，也挽救了那位闯将，可以说还救了我们自己。这个场面对我触动很大。武斗中一旦死人，人们的情绪就无法控制，就会丧失理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悲痛之中，我内心充满自责和担忧，作为战斗组长和带队者，我怎么向李磊落的家人交待，怎么向同学们交待呢？

李磊落的死在学校引起很大反响。陆续有很多人，大学生和中学生，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

的，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愿来到常德，要继承他的未尽事业。然而，来人越多，我作为一个头头的思想负担就越重。

9月初发生了两派相持中最激烈的小西门武斗。那一天，红联一方半夜偷袭，激烈的攻防拉锯中我方有十几人阵亡，而打死对方三四十人。我们战斗组的朱以文被子弹洞穿腰部受伤，是孙铮她们两位女同学抬下来的。一候船大厅临时改作战地医院。大厅里弥漫着呛鼻的酒精味，地上蒙着白布的遗体赫然排成一行，十分刺眼。其中就有北京化工学院的胡宝新，他们一行四人刚到常德没有几天。那一刻，我别无旁骛，只想如何把大家平安地带回学校。后来朱以文转到长沙手术，所幸未伤到内脏，住院半个多月，随我们一起于9月25日返回北京。回来后我们又派一同学返回湖南，找到47军和省革委会，为李磊落办理了“革命烈士”证书，拿到抚恤金2000元，一并交给了他哥哥和弟弟妹妹。

Y：你们一起去的同学一死两伤，在清华外出的几千人中伤亡最惨重了。

S：据我当时估算，八、九两个月间常德武斗中死亡的总人数，双方合计有三四百人。推而论之，全湖南省，乃至全国该有多少人死于大武斗啊。我亲历了战友的牺牲，见证了武斗的惨烈，更意想不到，对立的两派都杀红了眼，不分伯仲都出现了私刑、虐杀、甚至活埋等恶行，所表现出的兽性与土匪几无二致。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感到迷茫：文化革命为什么会变成残酷的“武化革命”？发展下去会成什么样？百思不得其解。

李磊落在长沙火化，骨灰由宋耕带回北京。8月13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纪念李磊落和在武汉“八一惨案”中溺水身亡的肖化时。美国友人李敦白、湖南“湘江风雷”头头叶卫东与会并发言。《井冈山》报报道：李敦白同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讲述了李磊落同志生前给他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最后他说：二位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们和一百多年前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睡在一起，他们和一九一七年攻打冬宫的勇士们睡在一起……兵团总部还编印了一本纪念册子，红色封面，绘有青松和孤峰，竖排七个毛体大字：国际悲歌歌一曲。

重新翻阅那本小册子，其中关于李磊落遇难的描述带有演绎色彩，因为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该书编辑、付印时收录了李敦白的发言，但发行时李敦白已随王力、关锋的倒台而失势，他的发言被撕掉，仅在目录里留存些许蛛丝马迹。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复原文革历史之难。即使文革中留下的文字资料，包括档案，也不尽可靠，更何况在派性之下选择性地处理史实是个普遍现象。档案不过是胜利者雕琢过的“正史”，其中的揭发交待材料更大可存疑。所以，我要特别向文革研究者和评论家进言，对关键性的、作为论据的史料，你必须按照治史的规矩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不要轻易采信，更不能随意推演、发挥，否则你发出的宏论只能是空中楼阁，非但落不到实处，反而会误导自己和他人。

Y：我们确实不能忘记文革中许许多多像李磊落这样献身的人。

S：我的文革道路与“打落水狗”和李磊落关系甚大。我们通过思想的交流相互影响，通过共同的战斗生活加深感情，产生越来越强的认同感，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我。事实上，每个文革参与者都从属于某一群体，从一个战斗队到一个派别。在派别斗争中，群体的思潮和行为往往受思想偏激的领袖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体都有程度不同的趋同性和归属感，甚至今天还在影响对文革的反思。探讨文革中的群体行为、群体与个体关系是个既有趣味又有意义的问题。

Y：是呀，还有很多社会学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你回校以后做什么了？

S：九月份回校后两派正在大联合，没有我什么事，我一度萌生退意。然而，李磊落的形象即刻出现在脑海里，我斥责自己的动摇，告诫自己：决不能当逍遥派。我决定做点实事，就是协助陈继芳抓干部工作和开展大批判等等。

我参与了1967年底团派“三大战役”的策划组织，重点批判蒋南翔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他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组织“第二套班子”对抗文革的罪行。第二套班子是指活跃在414派的那些干部，如罗征启、谭浩强等。陈继芳领导下的第二办公室负责团派“解放干部”

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些干部专案组，比如，斗蒋兵团、八五支队、九六支队、吕应中专案组等。我负责联系其中几个专案组。九六支队专搞谭浩强、罗征启等干部专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演化成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罗文李饶”专案组。

Y：罗文李饶专案由罗征启开始，你是直接当事人，请谈谈有关的情况。

S：1967年秋冬，两派围绕着干部问题展开激烈斗争。我们掌握一些材料，揭发罗征启反中央文革，还讲过“极左的根子在林彪”这样的尖端言论，根据“公安六条”足以将他定为反革命。于是，总部决定派保卫组和代表队一起抓捕罗征启。1968年1月30日是大年三十，罗征启回家过年时被抓获。后来将他关在化学馆地下室，以九六支队为主组成“130支队”进行审问。我作为负责人之一全程参与其事，包括连续几天昼夜不断的审讯，其间还打过他胸脯一拳头，是我成人后唯一一次动手打人。我们的逼供信对罗征启老师身心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我内心一直充满歉疚。1980年为我考研录取的事，罗老师专门给哈工大写信，信中特别申明：他审讯过我，搞过一些逼供信，但他本人没有动手打过我。罗老师是有意的隐恶扬善。30年后我第一次看到这封信时，内心顿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

（未完待续）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三）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1 0 a，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967.6—1968.9））

### 第十三节 痛惜英才早逝，缓步走进李磊落的灵堂

1967年的秋天，在武汉7·20事件88前，学校里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武化革命”论调的大字报，414总部和我对此都是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7.20是一个突发事件，总部研判了形势，认为要关注外地的武斗形势，但是仍然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主要方向，所以主要精力依旧集中在“揪刘火线”上。

7月31日晚上广播了《红旗》杂志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席卷中国。

我们都认为两报一刊社论代表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414对这样的大道消息是极为重视的。我对《红旗》社论更有兴趣，更多一份信任。如1966年10月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三期社论、1967年2月关于必须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的第四期社论，都对我研判大局紧跟形势起了极大的作用。所以，我对《红旗》社论的这个新口号和新动向没有什么疑问，认为这是下一阶段的运动方向。

早在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到过：“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既然党内有一小撮，政府里有一小撮，那么军队里肯定也有一小撮，这样的推断是顺理成章的。

在这篇社论的指引下，在中央文革首长的鼓动下，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认为下一阶段的运动重点就要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了。

清华的团派和414派都不甘落后，团派表现得更胜一筹。团派早在外地建立了不少联络站，财源充足，于是大批人马去外地揪军内一小撮去了。8月3日上午，414在西大饭厅召开了战士大会。会上，群众强烈要求派人去外地，炮轰头头思想右倾、行动迟缓，落在团派的后面。头头感到压力很大。

8月6日上午，414召开了一次全体总部委员都参加的非常重要的会议。沈如槐传达了8月5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的周恩来回答蒯大富等提问时的谈话。沈如槐说，中央没有让大家出去搞第三次大串联的意思。大家分析、研判，一方面感觉到中央似乎并不鼓励大家去外地揪“军内一小撮”，另一方面又看到在《红旗》社论的鼓动下，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日盛一日。总之，去或不去揪“军内一小撮”，似乎都有道理，都有依据。但要是什么都不做，在这样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中明显落在团派后面，将来会很被动。在矛盾、纠结之中，总部最后决定先派一些人到外地去看看当地的情况。

一讨论到要派一些头头出去，总部里的学生头头们都争着吵着想出去，认为留在学校里也做不了什么事情。连沈如槐都说想出去外地调研。这一来更吵翻了天。谭浩强、胡大炘等干部问，还要不要坚持搞大批判了？傅正泰老师说人少也要坚持大批判。学生头头与他们吵，说他们是书呆子气。龙连坤生气了，拍着桌子说，都吵什么啊？我也发了脾气，说你们都要出去，我也不干啦！总部会议开成了一锅粥，没形成定论。

8月上旬，414先后放了四五批共二三十人去了外地<sup>89</sup>。总部委员中，沈如槐、陈楚三、宿长忠、刘万章、张雪梅、王永县、吴栋、郭仁宽等多位总部委员也多以视察联络站、调研当地形势的名义去了武汉、南京、广州、哈尔滨、长春、沈阳、长沙等地。总部要求出去的委员对各地军区领导，先认真调查研究，该保的一定要保，确有问题的也要揪。总部委员中，傅正泰、李秀芙、魏洪波、谭浩强、李振民等干部、教师都没出去。学生委员中，我、汲鹏、蒋南峰、周泉缨、黄瑞和等都留下来了。

我之所以没出去，并非是因为路线觉悟高，而是因为我向来对打打斗斗揪揪这类事情没多大兴趣，更别说是我要去涉足我不熟悉的外地和我一无所知的军区问题了。我觉得批斗刘少奇、解放干部这些事情也是大方向，总得有人做。要说兴趣，我对清华的两派斗争性质的研讨可能更有兴趣。此外，那时的我，革命激情已经减退了许多，远非1966年下半年的时候可比。就这样，我就待在学校里，哪里也没去，哪里也不想去，坚持做点大批判的工作。我还把很想到外面去转转的汲鹏也劝阻下来。

因人员外出过多和注意力的转移，所谓大批判只能是维持一个门面，清淡了不少，两派的派战无形中也缓和了不少。

8月10日，414总部办公室接到北京市革委会的电话通知，要414派代表出席当晚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首长接见。当办公室的赖老师告诉我沈如槐不在，我才知道他已经去了外地。我先到市革委会取了票，接着赶到人民大会堂。那晚，中央首长听取大家的汇报。第二天，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长篇报告。他批判了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的错误论调，并且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他在报告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毛主席说了，揪“军内一小撮”是自毁长城！他要求各个造反派组织不要再派人到外地去，已经派往外地的人员要全部撤回来。

我觉得周恩来代表中央所做的明确指示实在太重要了！那时候还没有随身可携带的录音机，全靠在小本子上记录。我没练过速写，但是我记得飞快，把讲话要点都记录下来了。回到学校

已是深夜，总部办公室里还有不少人在等着我的消息。我简单地把周恩来报告的精神传达了一下。第二天上午召开4 1 4的全校大会，“孙怒涛传达首长讲话，号召全体4 1 4战士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努力学习首长讲话，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接着我连夜把笔记本上的速记稿改写成比较通顺完整的记录稿，并录了音，在4 1 4广播台上反复播放。之后，在《井冈山4 1 4报》上登了启事，又叫蒋南峰通知在外地的人员速速返校。同时，赶紧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牵头单位“海直红联总”拉关系，并组织了一些拥军活动。

就这样，掀“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很快平息下来，在外地的人员也陆续返校。

8月7日凌晨，团派的李磊落在湖南常德的一次“战斗”中不幸去世。我不知道这次“战斗”是不是与掀“军内一小撮”有关。我从团派的广播中得知他是站在汽车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向前冲的时候被机枪扫射中弹倒下的。这以情节我至今还记得。

我与李磊落并没有很深的交情，仅仅是一面之交。王允方与李磊落很早就相识，他们是学校乒乓球队的好朋友。他曾带着我找到李磊落的宿舍，想认识一下并看看李磊落能不能也来“第一湘江”。

李磊落是一个长得很清秀很聪慧的小伙子。他走了，我心里很难过。

8月13日，团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李磊落为“革命烈士”，并在二教的二楼为他布置了灵堂。那几天，团派广播台广播的都是悼念他的文章，不时捎带着几句对4 1 4不太友好的话语。

我不认为李磊落是英雄、是烈士。这并不是因为他是团派我才这样认为。但是我还是非常痛惜他，因为他是一位仅仅见了一面就给我留下很好印象的朋友！

那天晚上，我在二教的楼下徘徊了好久，心里想着要不要进去表示一下我的哀悼。作为4 1 4的头头，我这样去吊唁合适吗？团派会对我白眼吗？会把我轰出来吗？4 1 4知道了又会怎么想？我有很多顾虑，我犹豫不决。后来我想，虽然我与李磊落的派别身份不同，但是毕竟是同学，是朋友。我并不是代表4 1 4去的，我只是以一个与他相识的同学身份，去表达一下我的哀思。

踏进二教大门，沿着楼梯一步一步慢慢地向上走。当我走上二楼出现在灵堂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守灵的团派同学眼神中满是惊奇和狐疑，怔在那里盯着我。他们显然已经认出了我。他们用眼神在问我：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只是，在肃穆的灵堂里，谁也不便说话。他们默默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不再理会他们的眼神，缓缓地走到李磊落年轻英俊的遗像面前，默默地注视着他，有好一会儿。然后向他低头、默哀、致礼。礼毕，我回身，缓步下楼离去。始终，我没说一句话。

这是我所认识的一位清华英才，他倒下了。很可惜！很不值啊！

我没有向任何一位老四说起这件事。我估计看到我来吊唁的这几个老团也没有传播这件事或者拿这件事炒作一番。在不幸死难的同学面前，派性是渺小而丑恶的。

#### 第十四节 中央首长排排坐，我亲见的周恩来

自从4 1 4独立以后，我作为4 1 4的头头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机会多了不少。

毛泽东、林彪都是深居简出的，我从来没受过他们的接见。他们之下的中央首长，我几乎都亲眼见过。

江青在接见的时候最喜欢讲话或插话。如果说第一次在静斋的接见我对她很有点好感的话，随着此后对她在公众场合印象的减分，随着她对蒯大富的态度越来越偏袒，以及她在接见的时候矫揉造作，在言语间常常挤兑周恩来，我对她慢慢地反感起来了。但是我知道她是毛泽东最亲密最信得过的身边人，我对她是绝对不敢流露出一点点反感的言词的。

有的中央首长说话不多，但是留下印象很深刻。如康生，给我的印象是城府极深，特像某一部电影中演反派角色的国民党军官，总是阴沉着脸。那个特别喜欢自称为“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像个迂腐的老夫子，看上去倒是很和善的。

还有好几个首长好像是陪坐来的，从来不说话。他们在我们面前虽然是大首长，在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面前，他们是不敢乱说乱动的小学生。所以他们看上去一个个像泥塑的菩萨，端坐在那里。除了眼珠子会动，全身基本不动的。那个空军司令吴法宪，脑袋上小下大的，特像我在外国历史课本中见到的有个叫路易菲利普国王的样子。我瞎想，看上去这么蠢这么笨，难道真的是一个特能打仗的四野纵队司令？

真正让我从心里钦佩崇敬的中央首长是周恩来。

他在1966年8月份两次在清华大操场的报告，感动了所有在场的清华人。那时我在台下，只能远远地倾听着、敬慕着。

当其他的中央首长在接见的时候都是高谈阔论“抓革命”，只有周恩来，除了讲“抓革命”以外，总强调“促生产”。作为一国的总理，他不能不想着几亿人口的衣食住行。他殚精竭虑地苦撑着文革的大局，那份劳心劳力，让我无比敬重。

当然，我敬佩他，还有派性因素。总感觉到我们与他的思想是共鸣的，总感觉到他的内心是同情414的。那时，一个不对414无端指责的中央首长，足以让我对他感激万分了。

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里，能经常受到他的接见，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能亲眼看到满脸疲惫又强打着精神倾听大家的发言，苦口婆心地劝说开导，从不以势压人地做指示。我的心里只有感动、钦佩和崇敬。

记得有一次接见过程中，周总理起身向边上走去，可能是想到卫生间去。走到半途，忽然听到接见的人群中不知那个造反派唱起了国歌。我远远望去，听到国歌声的周恩来马上停住脚步，端着右臂，一动不动地凝立在那里，直到这边唱完以后才再起步。那份不留下一丝把柄的小心谨慎，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如果接见的时间比较长，中场会有短暂的休息。这时总会有一些人奔向不同的中央首长前去请教、提问、反映问题等等。围着周恩来、江青的人总是最多的。有一次，我，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都围到周恩来的前面。我们与他之间，只隔着一排当作主席台的条桌90。他站在条桌后面，上身前倾着与我们说话。我也前倾着，与他脑袋的距离也就是三四十公分。我非常想与他说句话，但是胆子小，怕我提的问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浪费了他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别的人一点也不胆怯、不客气，东一个问题西一个问题地不断问着。我就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不停地扫视着他修过脸以后带点青色的络腮胡子根茬茬，还有浓密的黑发和已有点花白的鬓角，

看着他深邃的眼睛，听着他微带一点南方腔的浑厚男中音，我心想：这是怎么样的一颗充满无穷智慧和神奇记忆力的脑袋啊！我为自己能这样近距离地与敬爱的周总理面对面亲密接触，感到无比幸福和荣耀。中场休息结束，我们依依不舍地回到座位上。我忽然想到，真正需要休息的是周总理，可是他连这一点点可怜的休息时间都被我们挤占了。我很难受。此后，再有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宁愿远远地看着，再也不忍心上前去挤了。

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心力交瘁地硬撑着。我亲眼见到他在接见的时候，太累了，用小方巾擦一把脸。太饿了，摸块饼干往嘴里填。十年文革，把一个神采奕奕、俊美帅气、精力充沛的周总理活活地累死了、气死了！

那个时候，我把毛泽东奉为敬畏的神，把周恩来奉为敬仰的圣。现在，神已经跌下神坛，圣也已经走下圣坛。了解了更多的历史真相以后，我才知道周恩来也是有错误、有缺陷的，某些方面还比较严重。他不是完人，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依旧是一个伟人。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年2月第一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